

[长篇小说]

# 来生再见

何顿·著

实力派文学大家何顿

继《黑道》畅销10万册后，2013又一重磅力作！

“如果还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

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  
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

一个个普通国人生命的愿景

来生

超度

活着

一群群铁血军人历史的恐慌

『文革』

内战

抗战

一名名乡土农民身份的焦虑

游击队

俘虏

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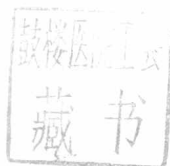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来生再见

长篇小说

／ 何顿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唱一首迟来的挽歌

——为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中阵亡的抗日将士

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好好认识，真是让人感慨、唏嘘。思考片刻，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大概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想那段倒霉和可怕、甚至令人说起来都齿冷的历史吧。而如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愈来愈被大众所忽略，代表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想的都是未来，展望的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而过好生活当然需要好的东西。拥有好的东西成了中国人及中国当下年轻人的话题，都着了魔。什么都想占有最好的，好房子、好车、好女人或好男人。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而身为国人的广大老百姓都想摆脱多年来困扰着我们的贫困，赶到前面去。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没搞政治运动，工业就比中国发展得快。二十多年前，中国人都以拥有日本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等而自鸣得意，假如你还拥有一辆日本小车，那屁股都翘上天了。

中国人健忘。

中国人从不痛定思痛。

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很少。

但有人说，民族情结是狭隘的。

什么是不狭隘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相信没有人能说清楚。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教室里，

—

我爹快九十岁了，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是这么说的，不信也不行。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 圣善夜 / 神子爱 光皎洁 /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 圣容发  
出来 荣光普照 / 耶稣我主降生

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年轻人，所以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从下午起到半夜，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都是祝“圣诞快乐”的，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也是我爹的生日，我便会展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多年前，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总是说：“过什么生日？不过，我不过。”

但不过也没用，这一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了，虽然我和妻子、儿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宾馆里、酒店里，甚至一些大学的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姐也会打电话说：“小毛，今天是爸爸生日，我们在哪过？”

我会说：“是啊，那我们去哪吃饭吧，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

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吃完饭后，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关了灯，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家庭活动，每年要搞一次，都是圣诞节这天。

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省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他们饿得要死，几天没吃一粒米，喝的是阴沟水，都没打算再活了。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我爹再次获得自由。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的。

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看病也有医保，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仍然不是很多。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还活着。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后来成了国际儿童节。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由于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不顾组织上约束，偷偷跑回家看儿子——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长级。但是在首都北京，官至副厅长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姐共一个母亲，姐比我大三岁。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

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

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

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捂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眼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游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小说，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小说。但是没有一个人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

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

爹头也不抬。

我换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

“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

“我家就是你的家，爸爸。”

“我要回黄家镇。”爹哭巴巴地指明道。

“回黄家镇干什么？”

爹说：“回黄家镇住。”

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那是镇政府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爹是离休干部，自然也分了一套。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一个人住着，一个人搞饭吃。但他不搞卫生，家里脏兮兮的，厨房里油渍渍的，弄得同邈里邈遍的狗窝一样。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溜了一跤，中了风，在地上睡了半天。要不是他的邻居——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上话都说不出，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他这样的年龄，再摔一跤，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

“小毛，我要回黄家镇。”吃饭时，爹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

我的小名叫小毛。我的大名叫黄跃进，我是“大跃进”那年生的。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我用困惑的口气说：“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

爹说：“小毛，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

“同坐牢一样？”

爹感到说错了话地低下头。

“你有吃有穿，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他家务，还坐牢一样？”

爹说：“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

“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音乐，家里有唱花鼓戏的DVD，你可以随便听呀。”

“听厌了。”

“那就看看电视。”

爹回答：“电视不好看。”

“那你要看什么呢？”

“我还是想回黄家镇，”爹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

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元买的，楼层为七楼，顶层，但没电梯。我买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上楼、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回家爬爬楼，这就是锻炼。我爹却无法出门。七层楼的上下，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都很吃力，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爹快九十岁了，人老得有些古怪了，思想也天上地下了，假如他下了楼，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爹为了不麻烦我，就尽量不下楼，想晒太阳就站在晾台上，伸出



头去迎接阳光，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犹如坐牢一般，白天又没人来，即使有人来，也不是找他的，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而且打电话聊天，爹又舍不得，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是浪费钱。我姐住五楼，住的是复式结构，有电梯。但爹思想封建，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他可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爹总是吵着要回去，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生自由一样。如果要送爹回去，也得征求姐的意见。姐是医生。我问：“爸这样子回去行吗？”

“绝对不行。”姐尖声说。

爹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偷偷地看着我和姐。

我说：“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我都烦了。”

姐说：“你看爸爸这样子，还能一个人搞饭吃？”

“不能，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

“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爸爸经常小便失禁，保姆会给他洗尿裤？”

姐说的是事实，这两年，爸爸经常小便失禁，要解小溲了，突然就急慌了神，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尿湿了裤子。而且他又要面子，你说他尿湿了裤子，他会否认。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要他把裤子换了，他竟不愿意换，说“不换，等下就干了”。这种状态，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我说：“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姐精干，但脾气较大。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她是内科医生，早几年评了教授，还出过两次国，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工作，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

爹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

姐咳嗽声，脸上有些愠色，又说：“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你想错了，爸爸。”

爹仍是那种表情瞪着姐。

姐生气地说：“黄家镇哪里好？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我们还没受够？“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没吃足亏？我是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

爹憋着脸，看着说话干脆、坚决的姐。

姐又说：“住在这里多好，吃饭、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卫生也不要搞，还要好舒服？小毛这样孝顺你，你还不满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不敢张嘴，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

姐说：“爸爸，你太不像话了。”

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凡是让她烦躁的人，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做人训，指出生死要害，一点也不留情面。姐还不甘休，继续教训道：“爸爸，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真的把你送回去，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

姐讲狠话道：“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要去你去。”

爹认错的模样回答：“好了，我不说这样的话了。”

“你过两天又会说，”姐驳斥爹说，“小毛都烦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

爹迷茫地张大嘴道：“我过两天又会说吗？”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

爹惭愧地低下头，想让自己镇静、清醒，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思维和交流，以免儿子、女儿冲他发火，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爹看着我姐，拼命回想着什么，临了问：“李香桃吗你是？”

爹又犯迷糊了，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

## 二

李香桃是我母亲，一位小学老师，生前在黄家镇迎春路小学教书。我大哥做过我母亲的学生，我姐和我都做过母亲的学生。李香桃老师如果还在世的话，也有七十七岁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初夏，李香桃老师对自己一狠心，投河自杀了。所以母亲留在我和姐心里的形象，永远是年轻的，但不漂亮。我母亲不漂亮，如果漂亮也轮不到长相像猩猩的我爹娶她。我母亲个儿矮，还很瘦，长一张阴麻子脸，二十三岁时嫁给了我爹，当时爹已满了三十五岁。那是一九五四年。在五十年代的黄家镇，二十三岁的女人还没找到婆家，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那个时候姑娘们十六七岁就结婚了，有的姑娘还只十四岁就嫁了人。两人经迎春路小学女校长介绍认识，见了三次面，就于那年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结婚了。一年后生下了我姐，隔了三年，生下了我。我和姐都出生在黄家镇医院。

我母亲李香桃是个严厉的女人，关于她的严厉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她当老师的缘故。留在我记忆里的母亲，不但严厉，而且好胜，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学校里争第一，这种性格的女人，竟然自杀了，真是匪夷所思。我曾问过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笑笑说：“像你母亲这种性格的女人，最容易自杀。”

我问：“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而跳河自杀？”

心理医生回答我：“因为她觉得自己输了，她最看重的是输赢，她输不起。”

最看重输赢的李香桃老师，为达到争第一的目的，不严厉也不行。于是我母亲对学生绷着面孔，为的是让学生别懒惰，别以为可以不做作业，别以为上课可以讲小话或做小动作。李香桃老师手中的教鞭可不是摆摆样子的，谁敢不做作业她就打谁的手板。脾气来了还打学生的脑袋。李香桃老师打人从不含糊，任何一只手板在她的教鞭下总要起一条条红印，这也是让一些学生于“文化大革命”中报复她的原因。他们把几根牛筋绳绞在一起，弄得很粗，用它来抽打李香桃老师。他们不但要把挨李香桃老师打的次数都夺回来，还想赚那么几下。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充满报复欲望的哥哥姐姐抽打我母亲，虽然恨得咬牙切齿的，却只能以沉默对抗。

身为小学教师的我母亲，不光只是对学生严厉，对我和姐也很严厉，脸上很少有笑容，说话闷声闷气，以此树立严母形象。母亲文化并不高，但她知道孟母教子，三迁其家，因而她用孟母要求孟子的一切，变本加厉地要求我们，动辄就叫我把手伸出来，打手板。假如我抵触，不愿伸出手，她手中的教鞭就可能更猛烈地落在我的脚或屁股上。如果是冬天，我还能占点便宜，因为裤子穿得厚，绒裤和棉裤，加罩裤，能很好地消化一部分教鞭落在脚或屁股上的力度。若是夏天，我就吃大亏了，因为母亲会更加狠地打她不听话的儿子。

我母亲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她应该是个男人才理所当然，可惜她是个女人。我和姐在小时候不怕爹，爹在我们眼里性情温和，很少对我们发脾气。但我和姐都怕母亲。她不跟我们说二话，要打，教鞭就下来了；要骂，什么凶狠的话都可以从她嘴里飙出来。诸如“你这个砍脑壳的”、“你这个丢人显眼的东西”，如此等等。

李香桃老师心性高傲，于是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在我们小时候，一家四口人的衣裤都是李香桃老师洗，一家四口人的饭菜也是李香桃老师操劳。爹在我出生前是镇供销社副主任，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的副主任。主任不愿意去的地方、主任觉得不重要的会议均让副主任顶替。于是爹很少在家待着，常常

几天不回家，一问，才晓得爹到县供销社调货去了。那时候湖南的工业相当落后，所有的货物都是紧俏物质，例如单车、手表、收音机等，甚至糖果、饼干也是紧俏物资。如果你不守在县供销社等，那么这些商品就可能永远不会光顾黄家镇供销社。我爹身为供销社副主任，就是负责此项工作。爹责任心强，不愿看见供销社的柜台上空空荡荡，又不放心他领导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亲自出马。当然一出马就是一天、两天，甚至三天不回家。

那是一个让我爹那辈人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且不顾妻室儿女的年代。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爹很少在家待着，星期天也是吃过早饭就不见人了。母亲说他把这个家当成了旅社。爹却不吭声。爹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也没当过小学老师，不会训斥人，只懂得做事、做事、做事。李香桃老师生他的气时，他就勾着腰，坐在门槛上，垂着头，就像一个知道自己犯了过错的大孩子。但不要以为他听进了李香桃老师的批评，当李香桃老师住嘴时，爹会以滑稽的样子问她：“你说完了？”

李香桃老师说：“还没完，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了。”

爹问：“你口干，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

李香桃老师愤恨道：“我看得你一副懦弱讨好相，你怎么不死？”

爹回答：“那不能死，主任要我好好工作，没要我死啊。”

李香桃老师道：“你就只敢跟我油腔滑调，换一个人，看你那德行，哈巴狗一样。”

爹笑，知道老婆骂完了，顺了气，便拍拍屁股上的灰，迟缓地左右望望，一转身就不见人了。不到晚上，甚至半夜，你别想再看见他的身影。爹不是去镇供销社忙碌，——我出生后不久，爹调进了镇政府办公室，爹是去找人下象棋什么的。我童年时候，黄家镇街上，成年人没什么东西玩，电视机还没走进黄家镇，麻将是被绝对禁止的，但常常有人爱摆象棋，就摆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下来对弈几局。爹中年时酷爱下象棋，面对着棋盘上的将士象马车炮卒，十分着迷，可以乐此不疲地与对手（无论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甚至不吃饭也没关系。

“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一脸威胁地冲我爹叫嚷。

我爹少年时候不叫黄抗日，叫黄山猫。这很好解释，在我们黄家镇，给男孩子取名都爱往贱的方向取，猫啊狗啊牛的，所谓名贱命长。猫啊狗啊牛啊都是活蹦乱跳或力大无穷的动物。黄家镇的上辈人就喜欢把孩子取名为这类命贱的家畜。

我爷爷认为世界上最贱的动物就是猫，传说猫有九条命，摔不死，打不死，淹不死，所以就给我爹取了个山猫的名字。黄山猫这个符号本来附在我爹身上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名字在一九三八年冬遇上了一个来白水县带新兵的国军营长，他是个很有几分热情且在洋学堂上了几年学的少校。他瞧着黄山猫这个名字皱起了他年轻的眉头，叫嚷：“黄山猫是谁，站出来。”

我那个离二十岁还差一个月的矮矮小小且长一张猩猩脸的爹马上站出队列，对少校营长恭谦地回答：“长长长官，黄黄黄山猫是是我。”

少校营长拧着年轻的眉头，攥着那本花名册想了几秒钟，自作主张地把黄山猫这个名字划掉。“听着，”他对红着脸愣在他身前的黄山猫说，“从今天起，你不叫黄山猫了，本营长给你改了名字，你叫黄抗日。明白吗？”

爹不明白，瞪着这个擅自替他改名字的长官：“长官，黄抗日是谁？”

长官觉得我爹愚钝，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便道：“黄山猫这个名字没有了。从现在起，黄抗日就是你，你就是黄抗日。听着，黄抗日，归队。”

身为湖南乡下汉的我爹怔怔地瞪着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长官说：“我是说你咧，你耳朵聋了？”

乡下汉顿时醒悟，原来自己一眨眼就变成“黄抗日”了。

长官命令道：“黄抗日，回队列里去。”

“明白，长官。”黄抗日向营长敬了个还不熟练因而有些扭捏的军礼。

李香桃老师把舀水的瓢一摔，“黄抗日，我要跟你离婚。”李香桃老师尖声说。黄抗日抹了抹疲惫的面孔，盯着她。“我又有什么不对吗？”

“你哪天管过这个家？你只晓得下棋，我真不懂，那几粒臭棋有什么好玩的！”

“那是你不懂象棋的奥妙。”

李香桃老师问：“奥妙？什么奥妙你说？”

“下棋能调节脑袋瓜子。”

李香桃老师不屑道：“你那木鱼脑袋，再调节都没用。”

爹说：“有用呢，人不动脑就会变痴呆。”

李香桃老师扫一眼我和姐，当时大哥在县城上高中，寄宿。我和姐经常挨母亲的打骂，这是因为我和姐都不愿帮她做家务。母亲伤心道：“你连他们穿什么衣服都没管过。我要你这样没一点用的老公做什么？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当时我六岁，也长着爹那样的脸型，所幸没有全盘照抄，脸上还继承了点母

亲的特征，比如嘴巴就像母亲的，不是我爹那样的扁长嘴，上下颌骨也没爹的那么外突。那时我刚懵懵懂懂地懂一点事。姐九岁，比我懂事多了。姐说：“爸、妈，莫吵了。”

母亲瞪眼女儿说：“闭嘴。还不闭嘴，一个耳光掴死你。”

姐看着我，我也看着姐。我脸上有笑容。

姐说：“爸妈要离婚呢，你还笑。”

爹瞪着脸型比较像他的儿子，低声道：“过来。”

我走了过去。

爹说：“你快要上学了，晓得吗？”

我点点头。

母亲说：“小毛都六岁了，你管过他一天没有？”

爹很内疚地瞪着我，也很惭愧地瞧眼母亲。爹动了动他的上下颌骨：“好了，是我不对，我以后不下棋了，多回来就是。”

李香桃老师表情坚决地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明天我们就去离婚。”母亲扫一眼我，估计是把我当孟子看了，“小毛我要了，小兰给你，我们各过各的。”

我怕母亲动不动就瞪眼睛打人，想既然妈一定要跟爸离婚，那我就应该跟不打人的，便说：“不，我要跟爸爸，不跟你。”

母亲气得脸都白了，举起手就要打我，爹赶紧护住我，笑了：“好儿子。”

李香桃老师当然不会同黄抗日离婚，假如她要离婚早就离了。黄抗日是李香桃老师的出气筒，假如她把出气筒抛弃了，那她找谁去出气？假如她不出气，八成会憋死。李香桃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叫叫嚷嚷的女人，她做了事，就有资格叫叫嚷嚷，好像一只母鸡生了蛋就要咯咯咯地叫一阵，以示自己劳苦功高。这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黄抗日。”

黄抗日“嗯”了声。

“做饭去。”

黄抗日二话不说，步入厨房，打量几眼后，慢腾腾地干着。但要吃到爹做的饭，很难，因为天黑了，米才下锅，而且饭烧糊的气味进了房间，他都没闻见。倒不是他故意不闻见，而是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做饭上，而是在象棋上，昨天的那局棋或前天的那局棋他为什么会输，为什么他舍不得斟炮？他会一个劲地思考，并想他之所以舍不得斟炮是战争年代对他的影响太深了，在战争年代，炮对于军队

有多么重要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他一看到炮，本能的反应就是珍惜，甚至不惜与对手兑车、兑马，也不愿意兑炮。

“黄抗日，你个砍脑壳的，饭烧糊了呢，”母亲边骂边冲进厨房救急，边把爹往门外赶边说，“滚滚滚，你做好事，饭烧糊了都不晓得把锅子端开。”

黄抗日茫然地望着骂他的女人。

女人说：“你做不得一点事。”

他说：“我刚才走神了。”

“又是想下棋的事吧，你这砍脑壳的？”

黄抗日暗暗惊讶，老婆怎么知道他心里所想，嘟着嘴说：“不是，我在想别的事。”

“黄抗日，这个星期天要做煤球，”老婆吩咐说，“这是你的事。”

黄抗日星期六就把做藕煤的机械借来了。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就爬起床和煤，将黄泥和煤拌在一起，一铲一铲地翻着。整整一天，黄抗日就在坪上做煤，弓着腰，将藕煤机对着煤堆一砸一砸的，不急不慢地干着，直到夕阳西下且坪上遍布他的业绩，他才感到自己为这个家做了点贡献的样子，停下来。这个时候身为老婆的李香桃老师就没气了，因为老公干了一天活，累了。她必定是打水给老公洗脸洗脚，甚至还会事先准备一斤桃酥——在那些年里，她的老公最爱吃的零食就是桃酥，分两块给儿子，给两块于女儿，将大部分桃酥让劳累了一天的老公坐在桌前慢慢享用，以示犒赏。

“小兰、小毛，你们两个不要望着爸爸吃，馋相，我要打人，”母亲会训斥流着口水的女儿和儿子，“他干了很多事，饿了。你们听着，谁干的事多，妈都会奖励。”

母亲总是不失时机地变着法子教育我和姐要勤劳，勤劳才会有好报。父亲做了一天藕煤，于是让父亲多吃桃酥，这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我和姐。我和姐都怕母亲，母亲在家里的霸道，在我和姐心里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会扭开脸，甚至走出门，不再看着爹吃桃酥。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就好像我们过去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样。这也可以证明，名叫李香桃的女人是疼她丈夫的。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这个虽然吵声不断，但温馨、快乐的家庭毁毁了。三个“毁”字连在一起，是以示彻底毁了。在一九六六年，即我进入小学二年级的那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还没波及黄家镇。那年“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北京、上海或长沙那样的大城市热闹着。但第二年，“革命”的火种传播到

了白水县，县城的学校停课闹革命，跟着镇中学的学生也上街了，举着红旗登着标语，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当时奇怪地想，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还要黄家镇的哥哥姐姐们保卫？接下来小学生也闹起来了，学校突然宣布停课闹革命。有一天晚上——那应该是那年初冬的晚上，有一群穿着让爸妈去裁缝店做的假军装，拿着梭标、大刀和木棒的哥哥姐姐们突然闯入我家，叫我母亲的名字：“李香桃——”

“李香桃滚出来！”

“滚出来李香桃！”

“李香桃滚出来！”

我们一家人当时都睡了，听见吵吵嚷嚷的敲门声，爹才拉亮灯，披着棉衣起身开门。他们不是冲我爹来的，他们是冲李香桃老师来的。他们是一群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左手或右手都挨过我母亲的教鞭。他们都惦记着那种痛的感觉。

“李香桃，起来，快点穿衣服。”一个六年级的学生绷着脸说。他曾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手板挨我母亲的教鞭很多，眼睛里充满仇恨。

李香桃老师总是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而毕业班则是由另外的老师带。这是李香桃老师的文化程度不够高，面对五、六年级的数学题目，她有些糊涂。李香桃老师起床了，开始穿衣服。进来的几个小学生，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一脸灰暗的李香桃老师。他们还都是小孩，但他们要装出大人相来。要装出大人相就得虎视眈眈。老实说，李香桃老师这辈子还没听说过学生喝令老师的事，也没经历过这种让人感觉滑稽却又恶狠狠的场面，一张阴麻子脸上就颇有几分慌张，想要是孟母在世，怕也只能乖乖就范。她穿袜子时，都找不到袜子口。那个眼睛里有仇恨的六年级学生天生就是个坏种——多年后喝酒醉死在床上——不耐烦了，他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而抓李香桃审问又是他们这支红小兵组织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他们很明白的革命道理！他当然要虎着脸，还当然可以不耐烦。

“快一点，李香桃。”他直呼我母亲的名字。

李香桃被他们抓到教师办公室里关了起来。这些大孩子把李香桃老师捆在一张靠背椅上，在捆绑时，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有什么事可以说清楚，不要捆人呵。”

一女学生说：“住嘴。”

另一学生也说：“住嘴。”



李香桃老师不肯住嘴，说：“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是教过你们的老师。”

“你住嘴！”红小兵总指挥一军皮带抽在李香桃老师头上，那军皮带的铜扣打在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只听见啪的一声，不一会儿，血从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涌出来，缓缓地在她左脸上流淌。

红小兵总指挥见几个红小兵骨干呆呆地望着李香桃老师左额上流淌的血，不知如何办时，他为了让他的“部下”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便指着李香桃老师乱扣帽子道：“同学们，李香桃是国民党暗藏的女特务，直接受命于蒋介石。”

“我不是国民党女特务，我从来就不是，”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我跟你们一样恨国民党、恨蒋介石！”

红小兵总指挥说：“你还想骗我们！”一军皮带打下来，打在李香桃的头上，又问：“还敢不承认？”又一军皮带抽下来，抽在李香桃的脑袋上，“还敢欺骗我们红小兵？”他说一句，军皮带便抽一下，“自己说，蒋介石给了你什么任务？老实交代！”

李香桃老师争辩说：“蒋介石与我李香桃没关系。他是人民公敌，我是人民教师。”

“你是国民党女特务！”红小兵总指挥指着李香桃，命令部下道：“给我打。”

那天晚上，李香桃老师被这群小孩用军皮带和牛筋绳抽打得皮开肉绽。

他们边打边找理由道：“你是坏女人。”

或说：“你是国民党埋伏在黄家镇的女特务，妄想变天。”

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是坏女人。”

他们抽一下，又这么强调一句，以示他们惩罚的是真正的女坏蛋。

### 三

我爹是我母亲被红小兵恶狠狠地抽打了一番，又斗了好几次后，才被镇革委会的造反派抓走的。事实上那已经是一九六八年过年前后的事。我记得那天很冷，地上结了冰。迎春路小学的水龙头由于冰冻的缘故，爹只好到隔壁的镇陶瓷厂挑水，这是陶瓷厂的水龙头扎了一圈圈草绳，做到了防患于未然，水管就没结冰。我爹步履小心——地上结了冰，很溜，挑完第二担水，倒入水缸，打算去镇陶瓷厂挑第三担水时，来了四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我认识其中两个，一个是镇革委会副主任，黄家镇造反派的头号人物，以前是镇武装部民兵训练股股长，姓严，是个转业军人。另一个姓刘，生一张尖脸，却长着一个与他的脸型不相称的大鼻子。